

◆新农村建设研究书系

新农村建设

THE THEORETICAL EXPLORATION OF
RURAL RECONSTRUCTION | 理论探索



◎温铁军/主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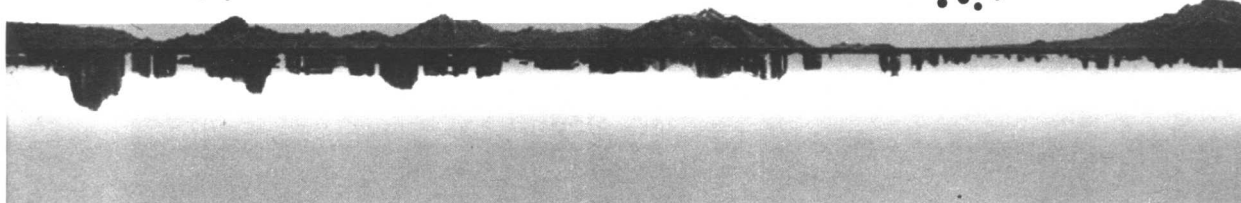
 北京出版社 出版集团
BEIJING PUBLISHING HOUSE (GROUP)

 文津出版社

◆新农村建设研究书系

新农村建设

THE THEORETICAL EXPLORATION OF
RURAL RECONSTRUCTION | 理论探索



◎温铁军/主编



北京出版社 出版集团
BEIJING PUBLISHING HOUSE (GROUP)



文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新农村建设理论探索/温铁军主编. —北京: 文津出版社, 2006

(新农村建设研究书系)

ISBN 7-80554-505-7

I. 新… II. 温… III. 农村—社会主义建设—中国—文集
IV. F320.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48227 号

新农村建设研究书系

新农村建设理论探索

XINNONGCUN JIANSHE LILUN TANSUO

温铁军 主编

*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 出版
文津出版社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

邮政编码:100011

网址: www. bph. com. cn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总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四季青印刷厂印刷

*

787×1092 16 开本 22.375 印张 317 千字

2006 年 5 月第 1 版 200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 000

ISBN 7-80554-505-7

F·40 定价:32.00 元

质量投诉电话:010-58572393



温铁军：

男，祖籍河北昌黎，1951年5月出生于北京。管理学博士，政府特殊津贴专家。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兼职担任河北省定州市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理事长兼院长、中国宏观经济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农业部农研中心特聘专家等。有过11年工农兵生活经历和11年农村试验区调研经验，最近10多年曾先后在30多个国家和地区做学术考察、交流和参加国际会议，被媒体称为“用脚做学问的学者”。我国当代“新农村建设运动”的主要发起人和相关学术研究的主要带头人；2003年度唯一以学者身份当选的“CCTV十大经济人物”；2004年，获杜润生基金会颁发的“农村发展研究奖（优秀论文奖）”；被人民网投票评选为2004年度“最受网民欢迎的强国论坛十位嘉宾”之一。

主要著述有：《中国农村基本经济制度研究》、《三农问题的世纪反思》、《解构现代化》、《我们到底要什么》、《认识与实践的对话》等。

新农村建设的背景、经验与教训^①

(代序)

温铁军

为此书作序的时候，我脑海中突然蹦出来一句似乎风马牛不相及的话——“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

本书能在2006年这个全面贯彻科学发展观、国家“十一五”规划开局之年出版，不仅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都实在重大，而且能够帮助各地有关部门的干部和从事农村研究的知识分子了解这些年国内的相关理论探讨与基层的新鲜经验。客观地说，这尤其是对那些长期奋斗在基层的农村干部群众和坚持不懈地在支农第一线的青年学生的一个鼓励。

因为，我们国家的农村政策从根本上说，主要产生于本国农村实践，特别是那些具有“拨乱反正”和战略转变意义的大政方针。在新农村建设的政策出台之前，很多地方的基层已经有农民和青年知识分子相结合的多种创造，作为农村发展的研究人员，我们也召开了多次相关的研讨会。所以，本书中辑录的大量经验材料所反映的基本观点，一是强调新农村建设的主体是广大农民；二是主张从事人文社会科学的知识分子只有与农村实际相结合才能实事求是地做“真学问”。

尽管社会上和理论界的一些人对我们这些年相对比较实际的做法和观点还有些不同意见，但在近年来向国家主管经济工作的主要领导的几次汇报中，我都着重坚持这些本属常识的看法。基层的实践经验和理论探讨，对于国家政策的制定是相辅相成的^②。

总结以往各地农村试验的基本经验，归结到一点是什么呢？就是组

^① 本文作者是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温铁军。本文主要内容根据作者2005年11月2日在“北京市农业现代化研讨会”上的发言记录整理而成，后于2006年1月12日在航班机上修改定稿。

^② 基于这些试验，我近年来几次向国务院领导和其他有关部门的主要领导汇报了我们在农村开展新农村建设的实际情况。

织创新和制度创新。我们需要从乡村基层开始，搭建进行制度创新和组织创新的平台。

一、新农村建设的提出

中国共产党于2005年金秋时节^①突出强调“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的时候，各地有些部门的领导干部似乎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但是，也有很多地方基层的同志已经较早地考虑到这方面的工作，并且已经有了相关的政策安排，有的甚至已经取得了很多成绩。在此前的三年时间里，我们在各地相继开展的试验，陆续总结出了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因此，可以说：

新农村运动（国外）+ 新乡村建设（国内）+ N个基层经验（地方）=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庸庸讳言，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既是执政党长期以来不断完善的执政理念，同时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理论联系实际的本土化认识过程。理论界正式提出“新农村运动”概念的，是1999年北京大学的林毅夫教授（下文另述）。此后的2001年，我把自己的关于“三农问题”的另类观点向中央领导进行了汇报，并在得到主要领导首肯的条件下，利用当时自己主管一个部委的杂志社作为组织载体，开始把一般的农村调研发展为组织青年知识分子和大学生志愿者下乡，直接操作农村基层的调研、培训。在这个过程中既结合了20世纪80年代从事农村改革试验区的经验，也融入了邱建生和刘湘波等青年人的提法，把晏阳初、梁漱溟等前辈20世纪20年代创立，在国际上已经颇有影响的“Rural Reconstruction”意译为“新乡村建设^②”作为我们当代的乡村支农活动的名称。

中国知识分子历来主张“君子和而不同”。理论家对新农村运动的概念解读和在新乡村建设的实践活动中结合本土历史凝练的概念有所不同。这两个方面的工作也没有正式结合，但在讨论中我们愿意主动呼理理论家这种有积极意义的努力。我曾经在林毅夫教授召开的一次北京大

^① 2005年9月22日党的政治局会议讨论了即将召开的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的议题，其中新农村建设即为政治局会议的主要内容。

^② 英文直译应该是“农村重建”。我认为中国人不喜欢带有否定过去工作成绩意思的“重建”，于是雅译为“新乡村建设”。

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研讨会上表示过，他关于新农村运动必要性的论述，对我开展的基层试验工作有重要参考作用；我并且不止一次地对媒体说明，他的提法在理论界是最早的。

2003年中国共产党连续提出“‘三农问题’重中之重”的口号以后，我以自己主管的单位的名义和中国社会服务及发展研究中心（香港）的刘健芝、英国援助行动中国办公室的张兰英等小型非政府组织（NGO）的负责人联合，先后指导和资助了以邱建生、刘湘波、何慧丽、姜柏林等青年知识分子下农村基层开展的制度建设试验，以及办在河北省定州市翟城村免费培训农民的“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①。随后，又进一步资助了受训农民回乡创办的各种合作社和社会公益组织。在这些试验中形成的政策建议除书面材料外已经两次向国务院领导当面汇报，并得到积极回应。这些汇报的内容，均可在本书中找到。

这几年，之所以能够比较实际地对新农村建设的国内外经验教训进行讨论，主要在于我和很多年轻同事大量进行了国内外的农村考察，尤其是开展了直接与农民相结合的基层试验。否则，就不可能有条件对这些经验、教训作归纳分析，也不可能出版此书。

二、正确认识新农村建设提出的背景

对于新农村建设而言，统一认识的难度很大，因此有必要先认识此问题。

众所周知，党的十六大以来在国家发展战略上已经明确了战略性转移的意图，无论是在目标上，在指导思想，还是在政策方针上，都已经相对明确地提出了发展战略转移的要求。2002年党的十六大正式把以往改革开放之初允许一部分地区，允许少数人先富起来这样刺激经济增长的思路作了调整，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作为到2020年要实现的大目标，这本身就意味着对以往发展思路的调整。这也是基于对以往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的认识而提出的。

^① 我主管的那个杂志社在我于2004年正式离开之后关闭了“农村版”，完全退出了这方面的工作。由于我当年主管的那个杂志社属于国有，除了在社委会一致同意的条件下开支了邱建生作为农村版编辑的工资之外，当时以该单位名义参与对“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的现金资助，完全来自我个人的存款。

因为，邓小平同志作为改革开放总设计师，在推进我国改革开放之初所说的一些话是辩证的，也是全面的。他反复强调：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让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他说了发展是硬道理，但同期也说了另外一方面的话，那也是非常重要的。他说，如果我们的改革开放搞出来了一个新的资产阶级，造成了两极分化，那我们的改革开放就失败了。这个预警，应该说是非常有前瞻性的。

在新农村建设的背景认识上，理论界陆学艺和林毅夫的作用都值得重视。

中国共产党在召开十六大之前，当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的政治局委员李铁映同志亲自安排了社会学研究所所长陆学艺主持全国抽样调查，形成了一个影响很大的报告，明确指出中国已经出现了十大阶层的差别，排在前三位的是官员、学者和企业家们，排在底下的是工人阶级、下岗工人和失地农民。这说明邓小平刻意防止的两极分化已经客观存在了，而且已经引起了尖锐的社会矛盾^①。

应该说，这种矛盾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就越来越严重了，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大家都知道的“上访族”。在北京经常能看到各个部委门口上访告状的人群，各地发生的成规模的上报到中央的群体性治安事件平均每天是两位数^②。面对这些情况，很难说我们国家现在的改革发展仍然是正常的。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刑事犯罪。人们应该知道，刑事犯罪从20世纪90年代进入高峰期以后，就再也没有下来过。一般情况下刑事犯罪是随着经济波动而变化的，经济增长高的时候，刑事犯罪就下降，经济增长低的时候，刑事犯罪就上升。而中国伴随高增长的同期，刑事犯罪的发案数量大体是在不断攀升的。

这两个情况越来越严重，显然不是一个正常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应该有的现象，而且已经影响到了国家的稳定，而稳定是压倒一切的，对此，中国共产党党内的同志都会清楚。但由于社会两极分化，贫富差距拉大，邓小平预警的问题正在恶化。

因此，在党的十六大之前，对报告征求意见的时候，已经在思想理

^① 可查阅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年度报告“蓝皮书”。

^② 2005年1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发言人披露的数据是每年七万多起。这是五年前的三倍多。

论界引起过很多讨论；其中就有关于“公平与效率”哪个应该优先的争论^①。只不过做地方实际工作的同志和在部门工作的同志对于党的十六大之前的有关讨论没有太多关注。今天我们的战略转移不是突然提出的，而是党的十六大以前对有关问题讨论时就已经有很多涉及了。我们不妨再引述北京大学林毅夫教授的分析。

1999年刑事犯罪和群体性治安事件不断增加，当这两个方面的问题累积到相当严重的程度的时候，林毅夫教授当时在一个小型讨论团体——“中国经济五十人论坛”上的一次发言就明确指出：我们现在是双重过剩条件下的恶性循环。就在同一年，他提出应该不失时机地进行“新农村运动”。

如果一般地讨论增长，很多地方政府官员都会说发展是硬道理，追求增长有错误吗？当然没有。但是他们很少讨论当前经济矛盾的本质，林毅夫教授算是一个“大海归”——美国芝加哥大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弟子——他不会轻易发出耸人听闻的判断，而应该是经过相当多的、比较客观的研究之后才提出的。

所谓双重过剩条件下的恶性循环是指什么呢？

首当其冲的是劳动力过剩。人所共知，尤其到2003年中央强调“‘三农问题’重中之重”之后，温家宝总理曾经有过明确表述：我们这个国家劳动力的总规模，如果算大数，几乎是全部发达国家劳动力总和的两倍。我们说，发达国家尚且有政府如何面对失业，如何提供社会保障等问题，还有社会不安定、罢工游行等事情。中国一个国家的劳动力几乎是发达国家劳动力总规模的两倍，因此当大家讨论制度问题、体制问题、政府改革问题的时候，就应该考虑：这个世界上有什么体制、什么制度、什么政府、什么政党能够解决如此大规模的劳动力的就业问题？

我国劳动力过剩的问题，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放开市场容易，解

^① 据我在作为评委参与的“中国经济学奖”杰出贡献奖的评审工作中得到的情况，四位获奖的资深经济学家中，刘国光得奖理由之一，就是他在党的十六大之前给中央的建议得到重视，他强调的就是：在贫富差别太大的情况下，应该提出公平优先于效率。对此延续了三年的争论，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文件已经给出明确提法：“更加注重公平”。我在十六届五中全会之后新华社播发我写的通稿中已经对此作出分析，各种媒体多有刊载。

决市场带来的问题难。近年来，我们就不得不面对世界上规模最庞大的劳动力进入市场之后引发的问题。以前劳动力过剩是隐性的，因为有城乡二元结构，农村劳动力是不能自由流动的，那时有矛盾但不显著。可现在是在其他要素没有完全放开的情况下，率先让劳动力完全走市场。有谁想过，释放八亿个农村劳动力进入市场，难道不是如洪水一般吗？

对于这个问题，当然应该辩证地看。我们大都一方面认为市场经济是好的，因此中央在 1992 年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但是，那时政府、企业和公众都没有搞市场经济的经验。1992 年城市取消了粮票与布票，同时取消了各种各样的居民消费票证，当年就出现了原来潜在的、隐性的农村劳动力过剩问题的突然爆发，农民工如开闸洪水一样宣泄而出。上点岁数的人都记得，那时候火车、汽车都爆满，顶上都有人，出现过严重的交通堵塞。那么当年的人口流动了多少呢？才四千多万，就造成严重问题了。

于是乎，从 1992 年社会开始惊呼民工潮，一“呼”就“呼”了十三年，现在还在呼，当然不再惊了。这个“潮”只涨不落，从当年 4000 多万人到现在的 1.2 亿人，几乎是当年三倍多。不断释放出来的劳动力的洪水，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劳动力几乎属于绝对过剩，是无限供给的生产力要素。

而按照要素的稀缺性决定价格的原理，这个绝对过剩要素决定的价格就必然导致劳动力的收入是绝对最低的，低到维持劳动力简单再生产的基本生活需求都不够，所以，在那些劳动力待遇太差而物价指数较高的地方，外来民工就开始“用脚投票”——不来了，沿海某些地方就出现了民工荒。这本来是一个经济规律导致的结果。可我们很少有人认真讨论这样的问题，大家还停留在以往一般发展主义和市场主义的语境中，没有多少人回顾 1999 年林毅夫教授当时的提法：第一个也是第一位的矛盾就是劳动力过剩。这当然会导致恶性循环——劳动力绝对过剩，无限供给，导致工价下跌，购买力下降，随之造成内需不足，这是一个恶性循环。第二个矛盾是资本过剩。我在已经发表的文章中分析到：中国早在 1995 年即成为世界上所有社会主义经济转轨国家中货币深化程度最高的国家。据 1995 年世界银行在 28 个转轨国家统计，中国

当时 M2^① 和 GDP 的比值超过百分之百，同期俄罗斯只有 27%，美国 76%，记得那时只有日本超过百分之百。20 世纪 90 年代中国通过大量增发货币，把我们的资源和资产用货币化的方式表现出来，这当然是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但也客观上造成了金融资本的相对过剩^②。到 1999 年这个问题比较明显了，于是林毅夫教授抓到了这个本质问题。

当资本过剩的时候，会出现什么情况呢？按照一般经济规律，当然应该是资本价格下降，因为过剩要素的价格应该下降。

但是，由于我们国家在劳动力下降到维持劳动力简单再生产的水平之下的时候，同时出现了资本要素过剩，结果就暴露出体制问题：在生产诸要素——土地、资本和劳动力要素的结合上，以某种制度安排来维持相对较高的资本价格。是什么制度呢？金融垄断制度，与权力结合的垄断能够维持资本要素的相对高价。

于是，劳动力走市场，金融资本客观上却不能完全走市场。这就是我们的双重过剩，这确实会造成林毅夫所说的恶性循环。

金融垄断资本的体制条件之下，金融资本为了维持高价格，只能追求投资收益最高的领域，于是，大量的金融资产，在股市收益高的时候进股市，房市收益高的时候进房市，但就是难以进制造业、民营经济，更不进中小企业和风险投资，无论后者有多么强的吸纳劳动力就业的能力，因为只有在高收益的领域中才能获得资本的回报。这导致实体经济部门在运转上出了问题：一方面劳动力无限供给，另一方面金融垄断，这两个问题导致中国经济出现了尴尬的状况——大家看到房地产的大发展，基金业、股票、期货等这些年也神速发展，而真正实体经济部门仍然有很多困难。

把这些问题回顾一下，大家就了解，并不是今天我们才有这种战略转变的思考，而是之前已经有相当多的讨论。我们看到关于这些问题的早期的讨论，就应该注意到中共中央在面对这些问题时作出调整，乃是

① 货币供应量按流动性划分为 M0、M1、M2、M3 四个层次；现阶段我国货币供应量划分为以下三个层次：M0——流通中的现金；M1——M0 + 企业单位活期存款 + 机关、团体、部队存款 + 农村存款；M2——M1 + 企业单位定期存款 + 自筹基本建设存款 + 个人储蓄存款 + 其他存款。M1 是狭义货币供应量，M2 是广义货币供应量，M1 与 M2 之差是准货币。

② 参阅我的宏观问题文集《我们到底要什么》，华夏出版社，2004 年版。

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一个实事求是的过程。

2002年以来，我们看到：从全面小康大目标提出之后，中央的战略转变指导思想日益清晰起来。“全面小康”这个目标刚提出的时候，温家宝同志尚未就任总理，他说：“全面小康大目标提出非常重要，但是我看难点重点都在农村”。到2003年1月份，当时中共中央提出“‘三农问题’重中之重”的时候，就明显表现出中央调整战略方向的意图。因为要想实现全面小康，就得把重点放在最大的弱势群体——农民的发展上。在此之前，江泽民同志就已经接受“三农问题”主要产生于宏观政策调整中，是我国的重大战略问题的提法。可见，中共中央在2001年对这些问题就已经很重视了^①。

2002年党的十六大之后，中共中央筹备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初步完成交接班工作就准备把这个问题强调到战略高度。当时，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指导思想，就是加强对农村的倾斜性投入，把财政资金新增部分用到县以下的农村公共开支，把国家的农业投资主要用到村以下和农民相关的项目。因此，大家现在逐渐熟悉的胡锦涛总书记的思想，早在“全面小康大目标”提出之后，就已经在党内明确了。

但是，据说当这个文件征求各部委意见的时候，大多数相关部委都不签字。之所以如此，也是有原因的。例如：各个大学正在大办房地产，高楼大厦一座接一座，这时候把教育投资用到农村，大楼没盖完怎么办？医院部门正在办国际一流的医院，也在盖楼、上设备，要停也麻烦。文化部门等都按照以往城市化方向不断加大城市剧场、影院投资。这时候，投资方向调整起来很困难。最后临开会了，新一代党的领导集体为了表示中央决心，召集在家的政治局常委上会，并且在会议上提出了“‘三农问题’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的口号，这就是2003年中央第一次强调“‘三农问题’重中之重”的背景。

矛盾客观存在，认识不统一的问题也客观存在。

^① 汪道涵老人家去世之后，我在上海出版的《瞭望·东方周刊》上发表了“怀念汪老”的文章，其中提及2001年汪老介绍我去参加江泽民同志主持的“三农问题”座谈会的情况。就在那次会上，我毫无保留地反映了大量基层调研的情况。江泽民同志听了汇报后明确表示：我原来以为农村情况还不错，现在看来形势很严峻，我会负责地把这些汇报的情况提交政治局讨论。

尽管中央这样强调，其实在2003年还是难以给县以下农村基层增加多少公共开支，也没有给村以下农民需要的小项目增加多少投资。当年，各个城市、各开发区的建设，不仅没有停住，而且变本加厉，一年就把耕地减少了三千多万亩。这是改革开放以来前所未有的最大规模的征占土地，当年的失地农民已经超过三千万。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上访告状、群体性治安事件激增，一方面经济高速增长，另一方面资源、能源消耗都是空前的，2003年中国的局面有些失控。

于是，到2003年的年末，中共中央讨论当年的经济情况和2004年的经济预测的时候，部分学者提出，我们确实存在某些部门或者某些领域、某些行业的经济过热现象，建议中央采取宏观调控政策。这时，方方面面的反对意见蜂拥而至，到2004年中央宏观调控政策出台，更引起了各地意见的极大反弹。

当时我在各地调查，回来后有一次向领导同志汇报说：据我的调查，可以说地方干部，无论省级、市级、县级，还是镇级，大部分不认同宏观调控，90%以上有认识问题；大部分企业家也不认同，理论界大部分也是反对的。领导同志说：我看认识不统一是正常的。到下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的时候，我会向全国人民交出一份满意答卷。

事实上，2003年中国农业、农村形势的严峻导致了2004年的宏观调控；而2004年至2005年的宏观调控使近年来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连续超过9.5%，被海外媒体称为“奇迹”。在中国共产党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2004年力排众议推动宏观调控以后，中国连续两年出现了曾经在2001年的美国出现过的“两高一低”——高增长、高就业、低物价——这就是曾经一度被国内学者和媒体炒作过的“新经济现象”。甚至有人据此认为“美国人改写了经济学”。而中国经济界之所以没有如国外那样炒作自己的新经济现象，一是因为在我国经济界很多人对宏观调控有不同意见，直到2005年上半年两个最著名的高校还连续出报告继续哀唱中国经济。二是我国的近代社会科学大体上师从西方，可西方至今还难以正视中国的发展历程，更遑论形成基于中国发展经验的理论。只有英国人最近提出个“北京共识”，那也不过是按照西方的意识形态来探寻中国不同于“华盛顿共识”的特色。

近年来的战略转变过程中，中共中央一系列的指导思想，乃至于政

策方针，确实是有远见的、实事求是的，是值得大家拥护的。可是，因为相当多的部门与地方的同志还停留在 20 世纪 90 年代的发展模式之中，不能解脱出来，所以产生认识上的不一致是正常的。如果进一步分析，就会看到认识不一致这种现象的背后，其实是利益结构的作用^①。

2002 年党的十六大战略转变提出，随之强调“‘三农问题’重中之重”（对此中央已经强调五次了，但至今不能得到所有人的一致认同），接着 2003 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大家知道每个三中全会相对而言都是集中讨论政策问题和改革问题的），明确提出了放弃单纯追求 GDP 的目标导向，转向综合发展，并且提出五项统筹之首就是城乡统筹，针对性很强。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之后这些提法被进一步明确为“科学发展观”，2004 年 1 月中共中央党校在新一届党中央正式确立以后举办了第一个省部级高级干部研讨班，由曾庆红主持，温家宝作长篇报告，首先统一全党高级干部的思想，即统一到科学发展观的新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上来。

它和以往有什么不同呢？首先，其基本前提不一样。

我们知道各地都是以招商引资论英雄，其实是以资本为本，以 GDP 来看政绩，也就是以资本论英雄。这是以往很多地方心照不宣的发展前提。而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意味着前提改变了——以人为本；而目标也很清楚——可持续发展。从这个前提出发，为了达到目标，就有一系列新的提法。例如，有效经济，循环经济，节约型社会等等。

这就要改变增长方式，改变原来单纯追求 GDP 目标导向之下的行为方式，改变政策的指导思想，要有一系列的改变。其中最重要的是：中央政府使用了宏观调控手段，同时紧缩两根——银根与地根同时紧缩；并且背后是看得见的手——政府的行政力量，使得我们能够在短期内避免出现过大的损失，经济能够较快地健康增长。这就是中国特色的两手调控，其促使了中国的新经济现象的出现。可国内的很多学者拒绝认同，国外也有相当多的评论——中国威胁论也就甚嚣尘上了。

就在这个阶段，一方面国务院出台了宏观调控文件；另一方面，中共中央出台了新世纪的“一号文件”。

^① 我在答《经济参考报》记者问的时候对此作了分析。

中共中央在所有新的指导思想提出过程中，始终强调把“三农问题”放在首位。随着“一号文件”强调增加农民收入而提出一系列政策措施，其中重要的就是贯彻胡锦涛总书记在2003年1月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之前就已经有的思想：把财政更多用于县以下农村基层的公共开支，把国家农业开支更多用在和农民相关的小项目上。这些都正在变成新世纪党中央的惠农政策。

但是，在没有转变各个部门的行为前，各级干部没有能够完全和中央政策思想保持一致之前，必须要让局面有所缓解，怎么办？2004年“两会”上，温家宝总理提出了免除农业税的政策：从2004年到2006年三年时间内彻底免除农业税。这个政策确实有效地配合了国家宏观调控，使2004年经济稳定、健康并且较快增长。因此，我发表文章说：“2004年新政之最大者莫过于免赋”。

归纳农业免税的背景就是：中共中央强调“‘三农问题’重中之重”，并且明确提出惠农政策思想，但在这个政策思路尚不能被贯彻的情况之下，2004年“两会”召开之前临时决定出台免税政策，以此化解农村基层的“三农”困境。这已经被实践证明是有效的。

接着人们都看到的是，由于各个部门仍然不能短时间内完全统一到科学发展观的认识上来，于是，中共中央在2004年召开十六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把科学发展观强调到政治高度——执政党执政能力的建设，于是我们就有了新的执政理念——构建和谐社会，其重要手段之一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和谐社会作为执政理念的提出，就等于对各个地方、各个部门，特别对党的负责干部提出政治上的要求，如果不能按照和谐社会的理念来调整行为，加强执政党的执政地位，提高执政党的执政能力，就是不能主动和中共中央保持一致。在此之后，2005年中共中央两次举办省部级高级干部培训班，统一全党思想，特别是高级干部的思想（此前的2004年年初举办了一次省部级高级干部培训班，统一高干思想，明确以科学发展观作为指导思想）。

综上所述，可以看到大的背景很清楚，就是中共中央在推进战略转变，提出新的执政理念和新的发展思路。但是，因为原有的利益结构已经固化了，条块分割，利益复杂，所以还很难让大家都统一到科学发展

观与和谐社会这样一个新的战略转变时期的指导思想上来。

在这样的困难情况下，在农村领域中“‘三农问题’重中之重”，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出，到这次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已经是第五次强调“‘三农问题’重中之重”。在这些问题上，中国共产党党员应该毫不犹豫地用行动表现自己在“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中重申过的誓词：跟中央保持一致——坚持和谐社会执政理念，加强执政党的执政地位。如果哪些行为不符合，就要调整。

三、应该从历史角度来看待新农村建设

我们知道，中国已经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我们在改革开放之前的二十多年属于工业化早期的原始积累。

那个时候，中央领导内部讨论就认为这是一个不得已的选择。薄一波同志写的“建国以来若干重大历史问题的回顾”一文中就说，当时中共中央讨论在农业国家一穷二白的基础上搞工业，总会有一部分人作出牺牲，尽管我们不愿意，但也迫不得已，就只能让农民作出牺牲。那时候中共中央也不是一开始就搞共同富裕，一步到位地实现和谐社会。正是由于当时很明确是要让农民作出牺牲，所以，中国早期工业化积累是从农民那儿提取的；因此才有后来毛泽东特别强调要照顾广大农民的利益言论。

为什么现在“三农问题”成了重中之重呢？我国不仅从一开始就从农业提取积累，而且，不同的原始积累方式导致不同的制度类型——这样的工业化积累方式必然产生制度上的路径依赖，造成化解“三农”困境的难度。

等到我们完成原始积累，形成工业化大生产的时候，实行对外开放，进行市场化改革。这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经济规律：现代化大生产形成的结构，就是产业门类齐全，专业分工社会化，必然要求社会化的大规模交换，社会化交换就导致市场经济，所以国家适时地进入改革开放阶段。

而改革开放这二十多年，我们从完成工业化的初期阶段发展到工业门类进一步完整的阶段，整个国家的制造业和竞争能力不断上升，到现

在，中国的经济总量上升到世界排名第六^①。

因此，从历史的高度看新农村建设的提出的第一个要点，就是国家现在已经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整个经济结构要提升，此时正是各种各样的矛盾最复杂的时候，如果农民对现状不满，农村就不稳定，整个社会就难以稳定，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需要的大调整将无法进行。其他发展中国家在这方面有很多教训。而在我国这样的历史阶段，中国共产党及时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标，客观上是要稳定乡村社会，顺利实现中国工业进入中期阶段的一系列的调整。

第二个要点，就应该指出国家经济发展到这个阶段出现了严重的困难：根据国家环保总局的资料，我们经济每增长1个百分点，就造成1.7个百分点的环境破坏。一些学者测算，中国经济五十年增长10倍，但是资源的消耗却增长了40倍。经济的最大困境，就是粗放式、高消耗的增长是不可持续的。

另一方面如林毅夫教授指出的：恶性循环导致内需严重不足，一般劳动者收入水平非常低，仅够维持生存，有的连维持生存都不够，根本没有余钱进入当期消费，因此我们这个泱泱大国的经济增长就主要靠外需拉动——2005年中国进出口占GDP的比重将会达到80%（2004年超过72%）^②。

把这两个情况结合起来看，难道我们破坏我们子孙后代的资源和环境，其实就是为了给外国打工吗？

中共中央从20世纪90年代就一直强调内需拉动，这么多年了，内需就是上不去，这样的经济结构合理吗？

中国能不能继续用这种方式来增长呢？显然不能。即使中国人说能，世界上也不允许。如果仍然维持大进大出，两头在外——原材料是外面的，能源也是外面的，在中国加工再卖出去——世界能源原材料市场会被中国人买得价格飞涨，而一般制造业产品市场将被中国压得价格偏低，“挤”了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制造业。例如，大量的反倾销诉讼，

① 如果按照PPP法算下来中国已经第二了，不管怎么说中国总体经济是在增长。

② 这个数字可能不合适或者不准确。一些学者在测算时认为，不能简单把进出口跟GDP比，因为GDP有很多没有统计进去的。不论怎么解释，这是一个连续指标，从原来是多少到现在增加到多少，还是有一定的依据的。